

探索巨人的足跡：李登輝與他的時代

松田康博*撰、魏逸瑩**譯

前言

在座的各位，大家午安。我是松田康博。今天主辦單位國史館邀請我擔任「民主與民主之外——李登輝百年誕辰紀念新書發表暨學術討論會」主題演講的講者，我既深感榮幸又不勝惶恐。首先在此，我要感謝主辦單位國史館陳儀深館長及家族代表李安妮董事長的指名，本人才疏學淺，但期盼能在這兩天專家學者們發表學術演講前，盡到「拋磚引玉」之效。

身為李登輝總統的友人，並且曾以李總統作為研究對象的主要日本學者有三位，包括我的恩師中嶋嶺雄教授、中嶋研究室的學長井尻秀憲教授以及若林正丈教授。在學識與經驗上，我遠遠不如他們三位。我本身是在1989年6月擔任中嶋教授主持的亞洲展望研討會日方秘書處成員時，首次有幸接觸到李總統。我記得當時李總統舉起食指指著總統府上方說道：「這是笨蛋的高塔」（これはアホの塔です），這一幕令我感到驚愕。李登輝總統想指出的是當時臺灣政治權力運作的愚昧之處。此後，我有幾次以團體的形式與李總統會面。2001年，我獨自對李總統進行了訪談，最後一次見面是在2016年11月，若林教授的科研費研究小組所進行的訪談。

在講演一開始，我想先介紹我跟李總統一部分的對話內容。在2001年進行單獨訪談時，有兩件事讓我感到詫異。其中一件是有關任命參謀總長郝柏村為行政院長的經過。關於這一點，李總統在許多場合證實他有意

*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 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拔掉郝柏村的軍權。我的提問是：「早年蔣介石總統在1950年任命陳誠為行政院長時，據說是蔣總統有意要分離陳誠和軍方。李總統是從這段歷史得到啟發，所以指名郝柏村先生為行政院長嗎？」對此，李總統露出訝異的表情回答：「真的有這樣的事嗎？我不知道。」我非常驚訝，同時也不可思議地感到理解。當時李總統只有27歲，還沒有打算涉足政治。他後來才在蔣經國學校學習政治現況，而在戒嚴時期，李總統和許多臺灣人一樣，盡量避免參與政治。從這一點可以得知，李總統的經驗和對政治敏感的外省菁英有所不同。

另一個提問是：「李總統為何選擇連戰先生作為接班人？」當時，李總統已辭去國民黨主席職務，有傳言說他與連戰之間的關係惡化。李總統的回覆是：「因為他學歷很高呀！」我對此回應感到意外，因為我原本期待的回覆是，連戰先生作為本省籍政治家擁有豐富的經歷。我能理解臺灣人喜歡高學歷，但完全沒想到李總統最初會提到這樣的理由。李總統接著說：「他的父親（連震東）和我過去擔任政務委員期間，共用同一個辦公室。那時，他的父親多次請我關照他的兒子。」這也讓我感到吃驚。在注重人脈的臺灣社會中，李總統如同他本人一再說明的那樣，給人的印象是不太重視人際關係的政治家。

上述兩件事所得到的回覆讓我對李總統的理解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第一件事的回覆與周圍人士對李總統作為權力政治家和戰略家的印象相反。第二件事的回覆則是與李總統對自己本身的性格描述不符。¹總而言之，李總統是一位超越周圍人士的解釋及他本人說明之上，應該以更高的層次來解讀的政治家。

今天，我希望能從這個切入點出發，盡可能客觀地分析李總統本人的認知以及來自周圍對他的毀譽褒貶。此外，在後續的演講內容當中，將會把李總統作為學術研究對象來探討，請允許我不再使用敬稱，而是直呼「李登

¹ 井尻秀憲，《李登輝の實踐哲学—五十時間の対話—》（東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8年），頁83；井尻秀憲著，蕭志強翻譯，《李登輝的實踐哲學：50小時的對話》（臺北：允晨文化，2010年），頁116-117。

輝」的名諱，敬請見諒。

一、世代及成長背景

李登輝是1923年出生的本島人，他曾向司馬遼太郎說過「我到22歲為止也是日本人呀！」²的感慨。由於他在19歲進入京都大學就讀，擁有這樣的經歷，很可能讓他在22歲以前強烈意識到自己是「臺灣的本島人」。直到1945年中華民國來到臺灣後，他才開始意識到自己原來是「日本人」。因為身分認同是透過與他人的接觸而形成的。

如果李登輝的出生早了10年，他可能無法趕上高等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如果他晚了10年出生，他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可能全部變成中華民國式的教育。如果他晚了5年，他可能無法適應突然開始的中文教育，並且在大學入學方面受挫。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在1988年成為臺灣的領導人，代表著接受日本的高等教育並完成人格塑造的人物，扮演了推動臺灣民主化的角色。這是歷史的機緣，也是不可能重現的奇蹟。

對李登輝而言，透過日語獲得知識及思想體系非常重要。他的專業是農業經濟學，但他從舊制中學時期起就學習各種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可以說李登輝所受的戰前日式高等教育，比起高度專業知識更注重豐富的教養，與我們日本戰後世代有所不同。李登輝從15、16歲時就是一位透過哲學來探索自己內心世界的少年。年輕時的李登輝熱衷於閱讀倉田百三、西田幾多郎、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及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等的著作，煩惱著如何面對生與死、如何肯定人生等等。由於當時也正處於戰爭時期，他不得不經常思考「生與死」這個哲學課題。³

² 司馬遼太郎，《街道をゆく40—台湾紀行—》（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年），頁82；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翻譯，鍾肇政審訂，《臺灣紀行：街道漫步（典藏版）》（臺北：臺灣東販，2011年），頁116。

³ 井尻秀憲，《李登輝の實踐哲學—五十時間の対話—》，頁28-30；井尻秀憲著，蕭志強翻譯，《李登輝的實踐哲學：50小時的對話》，頁45-47。

另一方面，李登輝的思想特徵是強調實踐的務實主義。他的職涯始於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農業經濟學是一門應用學科，如果不能應用這些知識和理論改善農業，它就失去了作為一門學問的存在意義。後來，他兩次前往美國留學，接觸到美式的務實主義。李登輝在年輕歲月的苦惱及工作上將務實主義付諸躬行，來取得實際成果，也就是說透過積極行動來展現其理論及信條，而不僅僅是空談，這成為他的信念所在。

我認為李登輝這位政治家是理想主義、務實主義及平衡感的綜合體。這正是李登輝實踐哲學的核心，我認為那並非源於他後來信仰的基督教或他在學生時期所接觸到的馬克思主義。臺灣歷史上政權更迭不斷，充滿著矛盾。在統治臺灣時，無法逃避這種矛盾。僅有理想主義而缺乏實踐，可能會因為嚴峻的現實而受挫。反之，單有務實主義而缺乏理想，可能會陷入虛無主義。李登輝是一位肯定人生並終身努力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取得平衡的人。⁴

二、在蔣經國學校的修行

李登輝雖然從農業經濟學者走上了技術官僚的道路，但由於他過於卓越，而被引導進入政治的世界。引導李登輝進入政治世界的是力勸李登輝加入國民黨的王作榮，而李登輝的政治導師則是蔣經國。正如某位警總人員在1969年約談李登輝時所說的「像你這種人也只有蔣經國敢用你」，⁵ 李登輝是蔣經國所發掘的人才，也可以說是蔣經國學校的畢業生。

蔣經國年輕時在蘇聯生活了12年，是一名娶了俄國人為妻的基督徒，有著複雜的背景。他身為國民革命、抗日戰爭的領導者蔣介石之子，在對父親盡孝以及對瀕臨滅亡邊緣的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盡忠的傳統價值觀下，在蘇聯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這兩個革命政黨中累積了自己的經驗。

⁴ 李登輝，《台灣の主張》（東京：PHP研究所，1999年），頁225-228；李登輝，《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出版，1999年），頁291-293。

⁵ 張月雲，〈附錄一回首來時路〉，收入李登輝，《臺灣的主張》，頁302。

《蔣經國日記》已在美國公開，但當中並未針對李登輝作出批判，相反地，蔣經國對李登輝給予了高度評價。李登輝本人也記載了蔣經國對他的喜愛，這很可能是事實。李登輝本人推測，這是因為他具有跟蔣經國一樣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⁶ 從《蔣經國日記》可以看出，蔣經國具有潔癖且工作狂的性格，厭惡豪言壯語及浮華社交，喜好默默完成工作的人。以躬行實踐為準則的李登輝顯然是蔣經國喜愛的人才。

在蔣經國政權時期，李登輝先後擔任過推動農業改革的政務委員、臺北市市長、臺灣省主席和副總統等職位，在事業上步步高升。

李登輝的幕僚曾告訴我，在李登輝擔任臺北市長期間，蔣經國持續好幾個月幾乎天天都會去李登輝的住家，與曾文惠夫人交談。換言之，當李登輝結束工作回到家時，蔣經國就在他家喝茶。就算是今日也難以想像，但蔣經國是以這種澈底的方式來評估人才。

李登輝與蔣經國共事將近16年，特別是近距離共事的6年期間，在蔣經國面前做了各種報告，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判斷，同時當面學習蔣經國的政治判斷。即使是同樣的判斷素材，也有不同的判斷準則和結果。⁷ 李登輝將這些內容記錄在筆記裡。與蔣經國的對話筆記出版成《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一書，這本書實際上是李登輝在蔣經國學校寫下的秘密筆記，是他下政治判斷的寶貴參考資料。

這種政治人才培養方式只有在威權主義體制下才得以實現，在民主化後變得困難。民主化以後，重要的不再是獲得獨裁者的信任，而是透過勝選才得以開啟通往權力的大門。說起來，李登輝獲得蔣經國的栽培這件事，代表著一位在內心深處暗中高度評價歐美式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在威權主義體制下被培養並登上事業的巔峰。也就是在威權主義體制中接受培訓的民主主義者推動了臺灣的民主化。

⁶ 李登輝筆記，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註，《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9。

⁷ 李登輝，《台灣の主張》，頁198-200；李登輝，《臺灣的主張》，頁266-268。

這對臺灣而言是一種雙重的幸運。即使從華人社會到美國或日本留學，也有許多菁英並未成為民主主義者。在中國或新加坡，認為「西方民主主義不適合華人社會」的人更是多數。然而，李登輝認為在臺灣社會讓歐美式民主主義扎根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李登輝與新加坡的李光耀最大的不同就在這裡。可以說在1988年至2000年這段對臺灣至關重要的時期，有這樣的領導者，才讓臺灣實現了民主化。

另一個幸運之處在於，李登輝作為在威權主義體制中培養出來的菁英，是國民黨內的「不倒翁」。民進黨雖然提倡民主化理想，但當時的黨國體制過於強大，同時為了應對中國大陸的威脅，過於急進的政權輪替被認為是危險的。如何在民主化的理想與權力政治的務實主義之間取得平衡，是李登輝就任總統時面臨的最大挑戰。

三、作為總統的李登輝：內政上的兩種平衡感

蔣經國過世時，李登輝未能及時趕上臨終的那一刻。⁸ 儘管他是副總統，但沒有實權，也不在權力核心之中。然而，由於蔣經國沒有計劃將權力移交給任何人，在黨政軍及特務機關之中都沒有栽培掌握大權的實力派人物。李登輝之所以能順利就任總統及黨主席，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身無寸鐵」，⁹ 在黨內沒有權力基礎，因此沒有引起警戒，被認為是容易被操控的政治家。

李登輝對司馬遼太郎解釋自己在黨內權力鬥爭中倖存的原因是「吃閒飯的，第三碗要靜悄悄地遞出碗來」（居候三杯目にはそっと出し）。¹⁰ 換言

⁸ 李登輝筆記，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註，《見證臺灣：蔣經國總統與我》，頁256-260。

⁹ 井尻秀憲，《李登輝の實踐哲學—五十時間の對話—》，頁99；井尻秀憲著，蕭志強翻譯，《李登輝的實踐哲學：50小時的對話》，頁124。

¹⁰ 其意思是「寄人籬下，懂得分寸」。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場所の悲哀〉，司馬遼太郎，《街道をゆく40—台灣紀行—》，頁391；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對談 生在臺灣的悲哀〉，收入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翻譯，鍾肇政審訂，《臺灣紀行：街道漫步（典藏版）》，頁536。

之，突然成為總統的李登輝首先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保持低調。另一方面，歷經全世界最長的戒嚴令的臺灣社會渴望改變。而且四百多年來，從未有臺灣出身的人成為臺灣領導人，這種歷史怨念給予李登輝光環。由於李登輝成為臺灣人民期待改革的象徵，使得國民黨無法將李登輝拉下臺。

李登輝在1990年的「二月政爭」勝出，獲得了為期6年的任期後，開始掌握並實際行使權力。在此之前，李登輝一直是「在國民黨裡寄人籬下的門客」。然而，在理念和風格上與國民黨截然不同的李登輝改變了國民黨和臺灣。

李登輝為了實現臺灣的民主化，必須在國民黨內鞏固獨裁的權力。因為如果首先將獨裁政黨國民黨民主化，將會選出威權主義式的政治家，像李登輝這樣的民主主義者將立即喪失權力，臺灣的民主化也會停滯不前。這是一個巨大的矛盾。面對這個矛盾，李登輝毫不猶豫地選擇在國民黨內部加強權力。李登輝被國民黨的非主流派視為「獨裁者」，而在臺灣社會及國際社會中被視為「民主先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

李登輝作為總統發揮了三種平衡感。第一種是黨內外的權力平衡。臺灣的民主化符合哈佛大學薩謬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提出的移轉（transplacements）類型。¹¹ 這意味著民主化過程是涵蓋保守派及改革派的政府與反對派的聯合行動。在體制內存在著改革派，他們試圖推動民主化，但遭到體制內的保守派抵制。體制內的改革派便利用體制外的相對溫和的反對派力量壓抑體制內的保守派，來推動改革。無須贅述，體制內的改革派指的是李登輝和國民黨主流派，體制內的保守派指的是國民黨非主流派及新黨，體制外的反對派則是民進黨及公民運動者。為了維持權力，李登輝不得不顧及黨內的保守派。不過李登輝在民進黨和獨派之間比在黨內更受歡迎。即使他在總統任內超過上百次提倡統一，沒有人相信他。這被稱為獨派的「李登輝情結」。正因如此，民進黨對李登輝抱持警戒並與李登輝的國民

¹¹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151-161；亨廷頓著，劉軍寧譯，葉明德校訂，《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臺北：五南圖書出版，1994年），頁164-172。

黨展開激烈競爭。李登輝在黨內外複雜的權力鬥爭中持續勝利，李登輝的國民黨始終是強大的執政黨。

第二種平衡感是在政策議題上維持保守與改革之間的平衡。李登輝首先召集體制內外的有力人士及專家召開國是會議，確立改革的方向。接著他以高額的退職酬金等作為交換條件，促使被稱為「萬年國會議員」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退休，之後分成兩次進行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全面改選。這被稱為「一機關兩階段的憲政改革」。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實施大大改變了臺灣的氣氛。於是，李登輝才踏入總統直選的修憲，實施了臺灣省長、臺北市長、高雄市長的直選，最後終於在1996年3月進行了總統直選。在全球各國的民主化過程中，如此耗時的案例算是少數。李登輝的改革因為考慮到保守派，因此採取漸進主義和妥協的方式。但這仍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感的改革，目標在於實現全面的民主化。

關於上述內政方面的兩種平衡感卻引發了針對李登輝的「黑金」批評。在李登輝時代，民主化讓國民黨地方派系進入中央的事實發生的同時，也形成了一種「神話」敘述，聲稱到蔣經國時代為止的政治都很清廉。但是，臺灣在民主化以前，實際上國民黨握有特權，存在結構性腐敗的政治體制。只有在蔣介石和蔣經國的監督範圍內，高官們才對貪腐稍有遲疑。

而且，國民黨為了便於統治，實際上容忍地方派系的腐敗。據若林正文教授表示，資深媒體人司馬文武評論李登輝推動的民主化改革如同「用髒水清洗污泥」。¹² 李登輝在了解國民黨存在著黑暗面的同時，認識到這是必要之惡並採取行動。即使是用髒水來清洗污泥，下水道也會比以前更乾淨。這應該說是李登輝的務實選擇。直到蔣經國時代為止，在國民黨裡面用來清洗下水道的淨水並不多。

¹² 若林正文，〈我的臺灣研究人生：〈臺灣人之心、日本人的行事風格、西歐的政治思想、中國式的皇帝〉——1990年代臺灣人眼中的李登輝形象〉（2022年1月19日），收錄於：「nippon.com走進日本」：<https://www.nippon.com/hk/japan-topics/g02021/?pnum=2>（2024/2/17點閱）。

四、作為總統的李登輝：對外政策的兩種層面上追求開放與抵抗的平衡感

第三種是新大陸政策及務實外交之間的平衡。相較於主張「漢賊不兩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堅持中華民國的法統和正式外交關係，自我孤立的蔣家兩代的大陸政策及外交政策，李登輝對於中國大陸以及與美、日等沒有邦交的國家，都相當務實地開放並且建立關係。作為實現民主化且代表臺灣的總統為何不能訪問外國呢？他反倒認為臺灣應該積極走向國際，推動海外出訪。同時，他大膽地推動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在臺灣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中國大陸也接著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兩年後在新加坡實現了「辜汪會談」，這都歸功於李登輝的務實主義。

兩岸關係和對外關係的平衡失敗的案例是1995年至1996年的臺海危機。中國大陸對李登輝訪美表現出意外強烈的軍事反應，導致先前的平衡瓦解。然而，李登輝對中國大陸的強力施壓做出堅定回應，在危機結束後延遲重啟兩岸對話。在國際政治學領域，這種作法被稱為「以牙還牙」（tit for tat）。因為如果讓軍事施壓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得逞，臺灣方面做出讓步，則今後每當兩岸關係惡化時都會引起解放軍再次施加軍事壓力。

換句話說，李登輝在危機處理的作法上追求更高層次的均衡。他強烈抵抗中國大陸的壓力，並且在尋求美國支援的同時，加強了臺灣的軍事力。此外，李登輝認為應盡早對中國保持警戒，限制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提倡了迂迴的「戒急用忍」及「南向政策」。當時根據李登輝的指示減少對中投資的臺灣積體電路製造（TSMC）在臺灣扎根，現在成為全球知名的半導體製造商，被稱為臺灣的「護國神山」。今日，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意識到中國的威脅和風險，並使用脫鉤（decoupling）、去風險（de-risking）等術語來制定策略。基於這些事實，可以評價李登輝的大陸政策有卓越的先見之明。

其次，李登輝強硬的大陸政策的象徵可以說是1999年「特殊國與國關係」的說法。對於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點發表這番言論，有各種解釋，但

實際上並不清楚，而李登輝本人的解釋也讓人不得要領。¹³ 但當時這番言論引起了中國的強烈反對和美國的強硬牽制。不過，在22年後，蔡英文總統發表了「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的言論，只有中國表示憤怒，美國並沒有提出異議。從這一點來看，可以說當時李登輝的言論可能是出於直覺，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很有先見之明。

五、作為總統的李登輝：將「政治藝術」發揮到極致

我注意到李登輝不僅僅發揮了平衡感，而且有明確的目標，並在不同的時刻重視平衡以實現這些目標。我認為，使李登輝成為民主主義者的原動力是他對司馬遼太郎說過的「生為臺灣人的悲哀」¹⁴ 以及「主權在民」的理念。對於經歷過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李登輝而言，有著臺灣「一定要屬於臺灣人」¹⁵ 的信念。正因如此，他用民主化促進「本土化」，用大陸政策及務實外交確立「臺灣主體性」的結果是相當重要的。

在維持平衡的同時，推動社會朝著自己認為的理想方向前進，這就是所謂的「政治藝術」。李登輝透過制定「國家統一綱領」並反覆強調國家統一，壓制了國民黨非主流派、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強烈反對。然而，民進黨和獨派並不相信李登輝是統派。能夠讓一部分人士相信自己的發言，又能讓另一部分人士不相信，這正是「政治藝術」的體現。透過這樣的方式，李登輝成功地極大化了他在國內外的支持。¹⁶

¹³ 井尻秀憲，《李登輝の實踐哲学—五十時間の対話—》，頁121-122；井尻秀憲著，蕭志強翻譯，《李登輝的實踐哲學：50小時的對話》，頁155-158。

¹⁴ 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場所の悲哀〉，收入司馬遼太郎，《街道をゆく40—台湾紀行—》，頁378；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對談 生在臺灣的悲哀〉，收入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翻譯，鍾肇政審訂，《臺灣紀行：街道漫步（典藏版）》，頁524。

¹⁵ 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場所の悲哀〉，收入司馬遼太郎，《街道をゆく40—台湾紀行—》，頁381；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對談 生在臺灣的悲哀〉，收入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翻譯，鍾肇政審訂，《臺灣紀行：街道漫步（典藏版）》，頁526。

¹⁶ 河崎真澄，《李登輝秘錄》（東京：産経新聞出版，2020年），頁203-205；河崎真澄著，龔昭勳譯，李明峻監修，《李登輝秘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21年），頁208-211。

在民主化、本土化的進展，以及臺灣主體性的確立上，李登輝是一名相當出色的舵手。不知不覺中，大家都被引導到李登輝所思考的方向。因此，李登輝不僅被高度評價為「優秀的戰略家」，同時也遭受「被李登輝欺騙」的指責。

然而，從1996年當選民選總統以來，李登輝政權的改革速度和質量都有所下降。特別讓我們政治學者難以理解的是，李登輝在1997年宣稱絕對不會參選2000年總統大選。根據修憲規定，李登輝能擔任2000年以後的第十任總統。但李登輝有意避免長期擔任總統職務。他說過：「我有一個夢，我不要死了（才把政權交出來），如果有機會（在活著時）交給另一個人，這可能是本人最高興的地方」，¹⁷ 這也是在這種背景下的發言。

然而，李登輝過早的退休宣言也導致了國民黨接班人的競爭和分裂，以及民進黨政權太早登場的副作用。從權力運用的觀點來看，這個宣言是失敗的。在1997年至2000年期間，李登輝的權力迅速削弱，許多改革議題停滯不前。「精省」改革在名義上是為了簡化臺灣省政府這個龐大的行政區域劃分，但實際上是為了剝奪當時影響力擴大的省長宋楚瑜的權力基礎，以壓住他的氣勢。這正是國民黨主流派在後李登輝時期的許多競爭者的最大動機。

從客觀角度來看，李登輝是一位在民主化和本土化過程中，為延續「改革後的國民黨」的壽命上做出了極大貢獻的領導者。即使在天候不佳、身體不適的情況下，他仍全力支持總統候選人連戰。然而，國民黨的支持者卻認為國民黨失去政權是李登輝的錯，他們聚集在總統官邸前，逼迫李登輝辭去黨主席。這正是前面提到的「政治藝術」的副作用。非主流派也打從心底不相信李登輝主張統一，並且認為他私下與民進黨串聯。

李登輝多次表示，成為最高領導者正如同站在觀音山山頂上。「山頂非常狹窄，四方都是陡峭的懸崖。實際登上山頂一看，光是站著不動，就覺得自己是站在極度危險的地方，整個人陷入一種不寒而慄的恐懼中」，「中國歷代的皇帝，稱自己為寡人。做總統就是站在觀音山上的情形，就是自己一

¹⁷ 〈李總統有個夢：要在生前交出政權〉，《聯合報》，臺北，1994年5月9日，版1。

個人」。¹⁸ 這如同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所言：「責任由我來承擔」（The buck stops here），顯示出最高領導者的孤獨。晚年的李登輝留下了「我不是我的我」¹⁹ 的這句名言。李登輝超越個人的「我」，達到更高境界的「我」。當時，沒有人理解李登輝承受著毀譽褒貶的孤獨。

擔任總統長達12年的李登輝透過「政治藝術」充分發揮了多年培養的理想主義、務實主義以及平衡感的政治家素質。儘管國民黨失去了政權，李登輝在社會上的支持率還是很高，在2000年卸任總統時仍是一位有足夠餘力及影響力的政治家。

六、卸任總統後的李登輝

我認為經歷2000年政權輪替後的臺灣，並未立即迎向全新的時代，而是暫時持續了一段「後李登輝時代」。在李登輝時代，他掌握了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臺灣呈現出一致的聲音。換言之，只要聽取李登輝本人及其周圍人士的發言，就幾乎能理解、預測臺灣的發展方向。然而，在「後李登輝時代」的臺灣，不再有「主流」及「非主流」，臺灣社會進入了「藍綠對決」的時代。進入「藍綠對決」的時代以後，不論聽取多少「藍綠」雙方的意見，都不能理解臺灣的發展方向。李登輝時代的臺灣在經濟、軍事方面都充滿自信，與中國相比毫不遜色。然而，在「後李登輝時代」的臺灣，面臨著「中國崛起」的同時，陷入政治空轉，並形成了對中國經濟依賴的結構。

2000年，從三腳督選舉獲勝的是民進黨的陳水扁。民進黨持續保留「臺獨黨綱」，但在選舉前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文」，採取了尊重民族自決原則的務實路線。此外，就任後的陳水扁提出「全民政府」及「新中間路線」等主張。可是陳水扁缺乏中央政府的經驗，而且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次不到三

¹⁸ 李登輝，〈國家領導的藝術〉（2003年4月5日），收錄於「李登輝基金會」：<https://presidentlee.tw/%E5%9C%8B%E5%AE%B6%E9%A0%98%E5%B0%8E%E7%9A%84%E8%97%9D%E8%A1%93/>（2024/2/17點閱）。

¹⁹ 井尻秀憲，《李登輝の實踐哲學—五十時間の對話—》，頁49；井尻秀憲著，蕭志強翻譯，《李登輝的實踐哲學：50小時的對話》，頁73。

分之一。中國大陸對陳水扁政權抱有戒心，不予理會，政權運作從一開始就處於危機狀態。

陳水扁向李登輝尋求支援，而李登輝為了穩定政權而提供了協助。²⁰ 群策會是跨黨派努力的表現，旨在決定臺灣的政策方向。然而，台灣團結聯盟（台聯）這個政黨，目的在於集結國民黨本土派，從旁支援孤立無援的民進黨政權，以形成本土派占多數的「國家安定聯盟」。從國民黨的角度來看，將本土派從國民黨分離出去是違反黨紀的行為，因此國民黨開除了李登輝黨籍。

在李登輝的周圍，像是群策會等等，有許多人認為李登輝應該站在臺灣社會整體的「制高點」，持續擔任臺灣本土政權的精神領袖。而且坦白講，李登輝對民進黨和陳水扁並不滿意。特別是他為了電力的穩定供應及國家安全所推動的核能政策，與民進黨的反核政策完全不相容。²¹ 陳水扁政權在2000年秋天決定停建核四，使得政權運作陷入困境。然而，即使如此李登輝還是選擇成立台聯，從旁支援民進黨政權。

為何會發生這種情況呢？原本代表非傳統國民黨政治人物，而且比國民黨更獲得廣泛民意支持的李登輝離開國民黨後，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東山再起與部分主流派成為黨內新的「主流派」，使得國民黨回歸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政黨。另外，宋楚瑜創立的親民黨為了掌握權力，決定與國民黨合作，並組成「連宋配」以出戰2004年的總統大選。繼承自李登輝的本土政權因而成了風中殘燭。

從李登輝在這段時期的行動來看，可以得知他不認為只完成民主化就好。民主主義的原則是多數決。只要是民主的，只要連戰、宋楚瑜以及國民黨、親民黨獲得多數選票，就必須接受結果。然而，李登輝下定決心不讓很

²⁰ 陳儀深、許瑞浩訪問，陳世局、陳頌閔記錄整理，〈黃昆輝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陳儀深、許瑞浩、歐素瑛訪問，《李登輝總統故舊僚屬訪談錄 I》（臺北：國史館，2023年），頁65；陳儀深、歐素瑛訪問，吳俊瑩、陳世局記錄整理，〈陳水扁先生訪問紀錄〉，收入陳儀深、許瑞浩、歐素瑛訪問《李登輝總統故舊僚屬訪談錄 I》，頁29-30。

²¹ 〈李登輝問：不要核電，臺灣怎麼辦〉，《聯合報》，2014年4月24日，版1。

有可能否定「臺灣主體性」的國民黨重新執政。因此，他認為本土派必須取得多數，也就是陳水扁必須再次當選。在連戰於2005年訪問中國大陸，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建立友好關係後，這個決心變得更加強烈。

然而，李登輝卻在此時遭受在總統任內「用髒水清洗下水道」的報復。他自己擔任國民黨主席時派上用場的國民黨黨產及特權猶存。國民黨豐富的資金和地方派系建立的利害關係網絡依然強大。這正是李登輝在任的12年期間，國民黨在選舉中持續取得勝利的重要動力。這恰好也成為了民進黨和李登輝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陳水扁開始主張「一邊一國」，用加強國防公投綁總統大選，強烈刺激選民的臺灣認同，最後在2004年僥倖連任。這個結果使得臺灣政治逐漸意識到臺灣認同才是「成長市場」。由民意代表所組成的台聯，原本在臺灣的政治光譜上應屬於「中間偏綠」，但在經過多次的選舉後往「深綠」移動。這是因為民進黨掌握政權後往中間靠攏，隱藏臺獨主張。因此，民進黨一方面試圖獲得李登輝的支援，同時也擔心會被李登輝奪取政治資源。儘管李登輝打算支持民進黨並且也對陳水扁的連任做出諸多貢獻，但他卻受到民進黨的強烈警戒。

在這段時期，獨派人士向李登輝接近。獨派歡迎李登輝，並視李登輝為新的象徵。李登輝在擔任總統期間超過上百次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臺獨。而且李登輝在卸任後一再表示從未主張臺灣獨立。儘管如此，卸任後的李登輝卻給人一種他在任期間就有臺獨構想的印象。這讓綠營人士對李登輝更加敬重，同時也加深藍營人士對李登輝的憎恨。

到了這個時候，包括中國在內，已經沒有人相信李登輝曾在總統任期內超過上百次主張統一並反對獨立的言論。那麼如果沒有人相信的話，反而不妨給人們這種印象，更進一步來說，李登輝或許認為，就算人們對他的印象是李登輝實際上是支持獨立也無妨。簡言之，我認為卸任後的李登輝為了增加本土派勢力，打了「政治藝術」的延長賽。

李登輝對進入第二任期的陳水扁政權非常不滿，隨著2006年民進黨政權的腐敗浮出水面，不滿情緒更加強烈。李登輝常常提到第三勢力的集結，但

台聯比民進黨還要深綠，台聯的存在跟他的意圖不同。直到2007年底，李登輝才在最後階段表明支持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謝長廷，但他僅表示：「我這一票而已」。²² 這是因為他對民進黨的強烈不滿，並且為了對即將成立的馬英九政權保持影響力。

李登輝在馬英九政權成立後仍試圖保持平衡。馬英九在總統大選期間刊登報紙廣告宣稱：「堅決主張臺灣的前途必須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²³ 並表示「喝臺灣水、吃臺灣米長大，燒成灰都是臺灣人」，²⁴ 並政策上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口號。馬英九曾是他的部下，與自己更親近的蕭萬長擔任副總統，王金平擔任立法院長。此外，台聯前立委賴幸媛出任大陸委員會主委，導致難以想像兩岸關係在政治上靠攏。馬英九對李登輝保持著禮貌的態度，李登輝也評價馬英九「深受美國影響」、「中共並沒有打從心底相信馬英九」。²⁵ 只要馬英九採取以臺灣為重的維持現狀路線，李登輝就會克制對馬英九政權的批評。

但是，進入第二任期後，馬英九政權向中國大陸急速靠攏，李登輝對此表示強烈不滿。針對與中國簽訂的服貿協定，國民黨立委張慶忠欲強行通過而引發的「太陽花運動」一事，李登輝在公開場合大讚：「真是了不起！」²⁶ 對於馬英九在2015年盛大舉辦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活動，李登輝在日本的月刊上投稿，以極其強烈的措辭批評：「企圖博取中國的歡心」（中國の歡心を買おうとしている）。²⁷ 而對於馬習會，他則批評道：「馬英九應該

²² 林河名，〈李登輝：我自己一票投謝〉，《聯合報》，2008年3月21日，版2。

²³ 中國國民黨，〈堅決主張臺灣的前途必須由臺灣人民自己決定！〉，《聯合報》，2008年3月14日，版6。

²⁴ 〈馬：換人換黨為臺打拚 籲給他機會為臺灣帶來繁榮 打下百年基業〉，《臺灣時報》，臺北，2008年3月17日，版7。

²⁵ 河崎真澄，〈李登輝氏會見要旨—日台關係『知恵生かしたい』—〉，《産経新聞》，東京，2008年3月26日，版6。

²⁶ 林宜樟，〈太陽花學運 前總統李登輝：真了不起！〉（2014年5月21日），收錄於「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013372>（2024/2/17點閱）。

²⁷ 李登輝，〈日台新連携の幕開け〉，《Voice》，2015年9月，頁38。

要在握手時，表明是中華民國臺灣的總統。」²⁸ 李登輝可能對於馬英九領導下的國民黨，一度看似重視臺灣卻急速向中國大陸靠攏感到危機。這也意味著李登輝並未改變，而是馬英九的改變所引起的變化。

最後，蔡英文政權尚未成為歷史，因此我不打算在國史館的學術討論會上進行探討。李登輝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支持蔡英文。成立於2016年的蔡英文政權，是繼馬英九之後，由李登輝的前部下所領導的政權。李登輝對蔡英文政權有期待也有不滿，但並未見到公開的批評。另一方面，李登輝對國民黨抱持更加絕望的看法，認為應該建立取代國民黨的政治勢力。這是李登輝自台聯成立以來一貫的想法。雖然李登輝認為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是錯誤的，但他也曾鼓勵臺北市長柯文哲「更上一層樓」。

李登輝期待的或許是，讓受到中國強烈影響的政黨邊緣化，實現兩個本土派政黨的政權輪替，來穩住臺灣本位的政黨政治。然而，自從2011年健康狀況惡化以來，李登輝已經失去了那樣的體力及影響力。我認為「後李登輝時代」大概只維持了十年左右。現在進入了「後後李登輝時代」，但李登輝構想的臺灣本位的政黨政治體制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實現，「藍綠惡鬥」也將終結。我認為這取決於臺灣人民未來的選擇。

上述的李登輝思想和行動，對他本人來說基本上是一貫的。或許當初李登輝也沒預料到臺灣社會的變化會走到這一步，他本身的想法可能也隨著臺灣社會的變化而逐漸有所改變。然而，正是因為他一貫堅持「臺灣主體性」，或許讓李登輝得以與臺灣社會一同改變。臺灣不像紐西蘭那種天然安全的島國。臺灣承受著來自中國大陸的巨大壓力，受到美國的庇護，處於脆弱的立場。然而，李登輝的行動最終卻換來他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和第三勢力等臺灣各方勢力遊走的污名。但我認為李登輝並不在乎。對他而言，守護臺灣比個人聲譽更為重要。李登輝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一直努力將自己置於臺灣社會的中心，如同「愛惜羽毛」般地守護臺灣。

²⁸ 廖欣俞，〈李登輝評馬習會：馬英九表現遠不及習近平〉（2015年11月12日），收錄於「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73738>（2024/2/17點閱）。

結語

最後，我想總結並結束我的主題演講。

正如我在一開始所提到的，李登輝的實踐哲學是理想主義、務實主義及平衡感。他肯定人生，並在總統在任期間和卸任後持續實踐「政治藝術」。他總是試圖將自己置於臺灣社會的中心，並在大多數的政治鬥爭獲得勝利。然而，這與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現實主義或虛無主義有很大的不同。他盡可能選擇更好的手段，以實現良善的目標。

李登輝並非以民調結果為依據來行動的政治家。「加入聯合國」、「總統直選」、「特殊國與國關係」等主張及政策，在李登輝發言並採取行動之前，都是極具高風險性的政治主張。然而，當他實際發言並採取行動後，能獲得多數民意的支持。他能預見自己的言行將如何改變民意，並在此基礎上發言並採取行動。換言之，李登輝不是迎合民意的民粹主義者，而是引領民意的政治家（statesman）。

李登輝多次提及《舊約聖經》「出埃及記」裡摩西的角色。²⁹ 簡單來說，時常經歷被他人統治的人民，只有在先知的引領下，才能建立自己的國家。而李登輝的意思，直到後來才被人所理解。對反對者而言，一切都為時已晚。正因如此，李登輝受到那些重視「臺灣主體性」的人們的尊敬，同時也遭到那些想要掌控臺灣的人們的敵視。

對於在20世紀至21世紀之間在臺灣度過長年歲月的人而言，要在政治上堅持一貫立場是不可能的。這正是臺灣作為「場所的悲哀」（出生地的苦楚）。³⁰ 臺灣走過的歷史和自己的人生雖然充滿矛盾，李登輝仍然不放棄年輕時的理想，不忘實踐，肯定人生，為社會帶來革新。李登輝抓住了奇蹟般

²⁹ 井尻秀憲，《李登輝の實踐哲学—五十時間の對話—》，頁54；井尻秀憲著，蕭志強翻譯，《李登輝的實踐哲學：50小時的對話》，頁79-80。

³⁰ 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場所の悲哀〉，收入司馬遼太郎，《街道をゆく40—台湾紀行—》，頁378-381；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對談 生在臺灣的悲哀〉，收入司馬遼太郎著，李金松翻譯，鍾肇政審訂，《臺灣紀行：街道漫步（典藏版）》，頁524。

的機會，基於個人的信念改變了臺灣社會。

今天，我與大家分享了我對李登輝的政治分析架構。最後，我想分享一則關於李登輝的笑話。有人這樣形容過李登輝：「講國語時像國民黨官僚，講臺語時像帶有流氓氣質的臺灣政客，講日語時像大學教授。」也就是說，李登輝的「我不是我的我」還具有更複雜的結構。李登輝在日本人心目中與他給臺灣人的印象有很大的差異。關於日本人和李登輝之間的特殊關係，我希望在其他的場合上再深究。

本日的學術討論會同時也是新書《李登輝總統僚屬故舊訪談錄》和「李登輝資料庫」的發表會。我期望今後這些資料能被多加應用，進一步推動李登輝總統及其時代的實證研究。上述的政治分析如有錯誤或不足之處，請各位不吝批評和指正。

我的演講到此結束，感謝各位長時間的聆聽。